

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亟待轉型的大背景下，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和本田員工罷工事件，預示着勞資關係乃至更大的國家—市場—社會關係即將發生深刻的變化。本刊歡迎海內外作者就此問題進行富有前瞻性的探討。

——編者

審議民主和代議民主

高全喜〈當代中國的諸位「德先生」〉（《二十一世紀》2010年6月號）一文，對當代中國民主理論圖景作出描述。

筆者贊同文中的一個判斷：審議民主只是代議制民主理論和制度的一種補充，它不準備、也不可能取代代議制民主制度。但這並不表示在較為完善的代議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就不能在中國推行審議民主的實踐。相反，在目前的特定情形下，審議民主作為一種實踐形態更有可能首先在當代中國落戶，甚至可能成為較為完善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接生婆。

理由是，其一，審議民主的實踐完全可以在治理而非政治的意義上展開，因此很容易為現有體制所接納；其二，它一旦開始運作，就可能為代議民主制度儲備各種必要的資糧。審議民主是一種高調的民主形態，其規範性理想是通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間理性的對話，以期就相關的公共政策達成共識。一方面，這樣的民主實踐對參與者是一個公民教育的過程，代議民主制度所需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的政治文化可以在這一過程中得以養成；另一方面，這樣的高調理想並不總是能夠實現，因此，審議民主的實踐可以讓公民熟悉投票的規則，並學會尊重程序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結果。這些成果無疑都是成熟的代議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審議民主和代議民主在當代中國完全可能齊頭並進，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談火生 北京
2010.6.30

「後普及」階段的互聯網

〈互聯網的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二十一世紀》2010年6月號）以帶有語詞系譜學特色的個案分析，處理了一個重要性不言而喻的大問題。

第一，關於互聯網文化研究的方法悖論和資源困局。一方面，對研究對象給予不是神聖化、就是妖魔化的刻板修辭，另一方面，對論述主體的姿態和聲音，作繁瑣的理論包裝和客觀化潤色。真正有實質意義的論證和論據，則完全搬運自互聯網本身。互聯網不僅是話語泡沫泛濫蔓延之地，更是有效信息富集之所。

第二，關於互聯網政治與現實政治的相反相生關係。〈互〉文的核心觀點之一，是互聯網監管者施加的「審查」、「封殺」行為，在作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為中，起到了無意的共謀作用。無論何種方式和程度的「審查」、「封殺」，在互聯網信息受眾那裏都不得人心。這也意味着互聯網並非沒有它自身的「政治」，它對現實政治的介入進行直接的話語免疫或迂迴的「惡搞」化解。

第三，關於網絡生活的疆域和權限。淵源久遠的「個人主義」和「人本主義」理念，在無遠弗屆的網絡空間的映襯下重放異彩。但進入「後普及」階段的互聯網技術變革，正加速推動網絡生活的流行模式，從開放共享的平面化聚眾轉向權限嚴明的科層化分眾。所幸迄今看來，互聯網總體上還保持着大眾狂歡的喜劇色彩。

李林榮 北京
2010.6.16

從哪個角度看民主？

王紹光《民主四講》之主旨是：「真正的民主」是個「好東

西」，而現在西方實際政治中的主流民主模式——以選舉制度為核心的「選主」——卻有種種缺陷，它們是「偽」民主，而他所說的「真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尋求的是讓人民大眾從形形色色的強制力中解放出來，包括政治上的強制力和經濟上的強制力」。

對於這一觀點的回應，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展開。第一，對「民主」定義（所謂「真」民主）的認識，基於對政治活動本身的認識。政治究竟是真理之爭，還是利益之爭？王紹光對西方民主歷程的解讀表明他採取的是利益政治觀，從而忽視了政治可能具有的真理一面，即政治有時是分辨對錯而不是簡單的分配利益，這是強世功和趙鼎新等論者間接提到的批評。第二，現在有沒有取代「選舉」這一基本模式的、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理想的可行民主模式？

王紹光提出了四種具有替代性的方案，而聶露的〈抽籤代替選舉？〉（《二十一世紀》2010年6月號）一文即具體地針對王著最重視的「以抽籤代替選舉」這一提議作出了精彩的批評，通過世界範圍內各種制度的細緻比較，從邏輯和事實層面指出抽籤作為替代選舉的基本民主制度之不合理，而且聶文的論證也很好地考慮到了第一個方面的批評意見。關於民主的爭論非常容易流為意識形態之爭，而王著的發表及其引起的嚴謹回應表明，中國知識界有能力與世界知識共同體站在同一平台上，討論普世性的問題。

尹鈺 北京
2010.6.27

媒體自由跳舞更需政治民主改革

杜耀明的〈媒體監察時弊的博弈空間〉一文（《二十一世紀》2010年6月號）中有一個重要觀點：「原本屬於公共領域的大眾傳媒，卻統統納入建制，逐步淪降為執政者的宣傳喉舌以至專政工具。」筆者不理解這裏的「逐步」是甚麼意思，難道建國以來，在現有的權力體制下，不是一直如此嗎？如果用一個比喻來看中國的權力架構，最合適的是一把傘。傘頂是黨中央，傘軸是各級黨組織。一通到底的傘軸把整個社會串聯起來。負責媒體監管的宣傳部門只是黨委分管輿論的一個工具。所以，中共對媒體監察的嚴格管理，是其權力運行的自然邏輯。

杜文多次提到「一黨專政」，但又認為政府對媒體管制太過嚴格。然而，黨和政府還是有區別的。即使握有更高權力的部門為了規避責任，往往都會把媒體監督引介其中，佔據有利的道德高點，獲得更多的合法性，但是由於中共如一把傘軸一樣穿插進中國的政治權力架構之中，上下級之間在意識形態宣傳模式上必然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所以，過份誇大這種偶發性的機遇所帶去的作用會有助於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機制，未免顯得過於樂觀。

很可能，隨着網絡等新興表達渠道的豐富、監察成本的劇增，以及部分有良知的新聞人的努力，媒體的自由空間會愈來愈大。然而舊有制度的路徑依賴具有非常強大的慣性，並且，在某些時候，政府會不計成本地壓縮既有的自由空間。

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本身不能進行民主化改革，權力之間不能互相制衡，這種通過新聞媒體所掌握的社會權力與政府部門握有的政治權力博弈的效果始終有限。

李磊 南京
2010.6.15

客觀審視「五四」紀念活動

楊濤的〈民國時期的「五四」紀念活動〉一文（《二十一世紀》2010年6月號）將視角對準以往較少關注的相關紀念活動，顯然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五四運動本身的體認。但是，作者對於政治因素的強調，如將國民黨政府對於五四紀念活動的支持或控制，僅僅歸結為意圖「利用國家權力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灌輸國民黨統治思想，其目的就是通過『五四』這一文化符號來達到箝制人民思想的最終目的」，卻容易將思維引向另一套話語系統——毛時代之政治話語。

對於五四運動的重新敘述和闡釋與闡釋者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息息相關。在強調政治、時勢因素的同時，亦應看到五四在思想文化層面的多維性。跳出某一政治立場，以更為客觀的目光審視國家權力以及其他因素對於「五四」這一文化符號的反覆塑造，同時結合思想本身的基本概念和演變邏輯進行探討，將更加有利於接近歷史真相。

曲曉雷 廈門
2010.6.27